

## 努力建立世界史学科的新体系\*

马克 珪

吴于廑先生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思路开阔,学识渊博,逻辑严谨,文辞优美,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学者。吴先生在世界史学科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给后人以许多启迪。我也是受到吴先生启迪、教诲的一个后学者,特把自己的一点感受写出来,以资纪念和缅怀吴先生。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师从齐思和先生学习世界中古史,并摸索着读一些中古社会、经济方面的书,希望能够有所深入。有一回读到吴先生所写的《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余》(《历史研究》1957.6)受到很大启发。吴先生此文,介绍了西方学者麦高文等所证明的蛮族各国法先于王、法大于王的观点,指出这乃是日耳曼马克公社原始民主平等的残余表现。它使我对马克公社学说、西方各国王权理论的认识有所深化,并启发我去注意历史研究中的法学问题。西方人的法律有其历史渊源,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一个初学治史者的我是很有启发的。直到现在我也还告诉学生,学历史者要学点法学。

不久我参加了周一良、吴于廑二先生主持编写世界通史大学教科书的工作,在齐思和先生指导下和教研室同志一起编写世界上古史,于是接触到世界史教科书编写中的体系问题。当时我们几个年青人很不满意苏联所编写各种世界通史中表现出来的西欧中心论、大国沙文主义等,很想另辟蹊径,搞出一个自己的体系来。可惜才识不足,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在经过一段学习、讨论后,只好作罢。但以后在教学、研究、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仍不断遇到这个体系问题,深感它难以解决。例如,大家都认为世界通史应编写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国别史的堆砌。又如,大家都认为编写世界通史不能以西欧为中心,为模式。可是我们写的各种世界史仍难摆脱西欧中心的阴影。后来我读了吴先生的《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4)一文,始觉豁然开朗。吴先生在上文中明确提出“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的意见,把这个体系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即应把世界史的结构、体系问题当作一门独立学科,建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深入研究,以不断开辟解决它的途径。

吴于廑先生提出世界史作为独立学科所应探索和说明的主题,应是“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即世界史的发展有纵向和横向两条线索。世界各地、各民族

\* 此文系作者于今年4月6日至8日为庆祝吴于廑先生八十华诞在武汉大学举行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吴先生突然逝世后,又经作者整理修改。

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历程,这是纵向的发展;而在发展中又相互作用,由相对孤立闭塞而走向紧密联系,这是横向发展。人类历史并非自始就具有世界性,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到16世纪海路大通,西欧资本主义触角先后伸入世界各主要地区,人类历史方始成为世界的历史。所以世界史学科所应研究的主题是:“世界历史经历了怎样的行程?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为了更具体阐述这个世界史学科体系,吴先生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等,使这个体系日见清晰,要研究的问题日更明确,指示后学以努力的方向。

自历史学兴起以来,人们囿于对世界史整体认识的不足,大多只研究国别史、断代史等。西方虽自文艺复兴以来即有所谓世界史著作,但这些世界史其实只是西欧史。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并研究其体系的,还是本世纪的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先后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二战以后,则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人类科技及文化发展史》,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以及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这些著作对解决世界史的体系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也都有其长处。但我们看来,欧洲中心的思想仍然是一个阻碍正确认识世界历史的大问题。即使像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提出写世界史应象站在月球上观察整个地球,但仍使人感到他的书强调的是西欧的独特性。1982年,美国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组织了《世界史协会》,1990年并出版了《世界史杂志》作为它的正式刊物,以推进对世界史整体的研究。相比之下,吴先生在我国倡导的研究世界史学科体系问题,在国际史坛上也并不多见,可证其高瞻远瞩,先声夺人。

当然,要回答“世界历史经历了怎样的行程,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这样的问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迄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世界历史的行程,或以为是人类争得自由,或以为是劳动人民求得解放,或以为乃是人类相互增进理解的过程。我国史学界则大都相信五种生产方式说,以为世界各国、民族,大体上仍按五种生产方式向前发展,如此世界发展有统一的模式,其行程也自然一清二楚。但多年来,按照五种生产方式模式认识世界历史,固然取得很多成就,也遇到不少窒碍难通之处,因此引发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论战。一些人认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西欧概括出的发展系列,和世界其他地区并不相合,不能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规律,于是逐渐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线说与单线说之争。单线说主张世界各国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共同的社会形态,亦即有着共同的行程;多线说则主张历史在欧、亚、非、美各地发展形态各异,不能机械地用一种模式表示。近几年,多线说似乎在我国也逐渐流行。一些同志认为,单线说是削东方之足,适西方之履,而多线说才能充分显示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但如果各国历史发展道路迥然不同,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等等也相差甚远,则世界各国由之也就没有了共同的行程,可能很难说是世界史了。

历史如何发展成为世界的历史,吴先生认为关键要研究15、16世纪。这时海道大通,西欧经济加速起飞,由农本而重商,其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影响世界各地,过去孤立闭塞的世界得到突破,逐渐连成一体。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资本主义萌芽是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有众多的理论,但我们要注意到,这众多的理论、争论,都是说明西欧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或归之于商业、贸易的力量,或归之于阶级斗争,或归之于生产力发展,或归之于所有制变革。这些理论,都未拿来应用于亚、非各国,说明亚、非各国的资本主义产生问题。对于亚、非国家,则往往有另外的理论。例如,我们所熟悉的马克·埃尔温的“高技术平衡的陷阱”学说,即他主张中国生产高度发展,宋代已到达近代化的门槛,可是由此陷入陷阱之中,人

口众多、技术发达、运输便利等等,使得不需要投资改进技术,也无那么多的资金去投资,从此陷入停滞、落后。近来,西方更有不少人从生态环境、人口、生产技术、贸易、国家政权等综合条件分析,论证这些条件的不同,使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而亚非国家则不兴,因而双方发展的途径各异。

事实确实如此。在15、16世纪这样重大的转折关头,中国、印度、奥斯曼这些强盛繁荣的国家,没有能跟上前进的步伐,逐渐落后,而偏僻的西欧小国——英、荷均蒸蒸日上,不久成为世界大国,并带动了西欧其他国家的发展。这种机会的丧失与获得,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是一种偶然、巧合呢?还是隐藏着必然的规律?我认为,这是历史经历了怎样的行程,如何发展成为世界历史这一体系中应努力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能使我们在构筑世界史学科体系时有一个重要的立足点。

自海道大通以来,这五六百年世界历史又经历了怎样的行程?也有着众多不同的答案。一方面,各民族、国家在生产、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亚、非、拉美诸国的步子也许相对还更快一些。世界各方面联系日益加强,正向一体化迈进。但另一方面,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更扩大了。按照发展社会学中一些现代化理论,如“世界体系论”、“依附论”等观点来看,则作为发展边缘地区的亚、非、拉美国家,是不可能现代化的,不可能和核心国家并驾齐驱。如此,近代、现代世界历史的行程,是一个世界的历史,还是两个世界的历史,似乎也是一个问题了。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谈到人生时说过两句话:“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充满了辩证法的。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大概也是这样,自其异者而观之,则发展道路迥然不同;自其同者而观之,则依然可以找寻出其共同的规律。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出一种正确的方法来。

吴先生已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后学者,应继承吴先生的遗愿,努力工作,建立世界史学科的新体系。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